

[文章编号]1009-3729(2013)05-0040-05

对西方政治学中两种平等观的评析

朱伟

(扬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9)

[摘要] 平等问题是人类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经千百年来的思考,近代以来,平等理论逐渐形成,“结果平等论”和“权利平等论”便是这一理论的两大分支。两种平等理论反映了两种平等观。实践表明,这两种平等理论、平等观都难以自圆其说,因为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死结——在私有制的前提下讨论平等、正义问题,因而不可能找到正确的、终极的答案。人与人的平等只有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人们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最终消灭私有制的过程中逐步实现。

[关键词] 西方政治学;权利平等论;结果平等论;评价

[中图分类号]D502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3.05.007

平等是政治学的重要概念之一。一般来说,平等是指人与人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处于同等的地位,享有同等的权利。但我们也应当注意,平等并非简单的数量相等,“平等”偏向“公平(公正平等)”的意义,体现了明显的价值判断的意味,是人类追求的最重要的价值目标之一。二战以来,人们对于平等问题的争论主要表现为结果平等与权利平等之争。后者是在批判前者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其理论自身也存在诸多缺陷。本文拟对这两种理论的演变及冲突原因进行分析,并评价其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平等观念的历史演变

从人类历史来看,平等观念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在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财富不足,人们为了抵御自然界的威胁而自然地结成群体,平等成为一种自然而非自觉。进入原始社会末期,由于金属工具(青铜器出现)的使用,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群体中出现剩余财富,垄断生产工具者同时也就占有了原本是公有的财富,于是出现了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人们开始意识到“不平等”,

“平等”观念应运而生。然而,人们真正地开始理性思考平等问题、“平等论”成为显学则是从启蒙运动开始的。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和等级制度的过程中,张扬的是“自由、平等、博爱”这面大旗,“平等”是他们提出的重要口号之一,关于平等的理论在这一时期也有了重大发展。伏尔泰提出,“凡是具有天然能力的人显然都是平等的”^[1]。卢梭则更全面地提出了平等的原则和要求:人人生而平等;财产应尽可能地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治权利人人平等……因此,资产阶级的平等观念是在反封建的过程中提出的,首先要求在人格、政治权利和法律权利等方面实现平等,其平等观对资产阶级和整个人类社会都有着重要意义。

20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不断加剧,权利平等问题、分配平等问题、机会平等问题、社会保障平等问题……诸如此类的平等问题接踵而至,生活在西方的下层人民纷纷表达出其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平等权利的强烈要求,工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罢工,黑人为了获得平等的社会地位而游行示威,这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近代以来的平等观念。在西方理论界,出现了以罗尔

[收稿日期]2013-08-18

[基金项目]江苏省研究生创新工程基金项目(CXLX13_885)

[作者简介]朱伟(1990—),男,江苏省南京市人,扬州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斯为代表的倾向于结果平等的理论和以诺齐克、哈耶克为代表的倾向于权利平等的理论之间的争论(注:关于平等问题的理论探讨纷繁复杂,为了便于说明,暂且如此划分;即使诸如德沃金、桑德尔等人对于两者都有批判,但实际上近当代政治哲学中的平等论始终是围绕这两者展开的),这两种理论及其争论对现代西方政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结果平等论和权利平等论的主要观点

1. 结果平等论的主要观点

资产阶级革命广泛胜利之后,人们逐渐对他们所期待的“美好国家”感到失望,尤其是在下层民众那里,贫穷、失业、种族歧视大量存在,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二战之后,美国提出“向贫困开战”,欧洲出现了建设“福利国家”的热潮。这些政治实践需要理论支持,而启蒙运动时期的平等理论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因此,在1960年代,罗尔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提出了逻辑更为严密、设计更为精致的平等理论,在西方引起了巨大反响。

罗尔斯认为公平就是正义。理解罗尔斯平等理论的关键在于理解其为达到公平而设立的两条公平原则——第一条原则: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平等自由原则);第二条原则:社会的和经济的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差别原则);并且(2)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2]

这两条原则是平等问题在社会生活中之两方面的表现,前者表现为政治权利平等,后者表现为经济权利平等。罗尔斯认为这两个原则存在“词典式序列”,即第一个原则(平等自由原则)优于第二个原则(包含两个原则:差别原则和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而在第二个原则里面,机会公正平等原则又优于差别原则。从罗尔斯的逻辑推演来看,他并非从一个宏观的角度进行平等制度的架构,恰恰相反,他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最少受惠者的地位——对于整个平等原则作出布置。因此,与其说罗尔斯的公平理论是为了实现每个人的平等,不如说它是在自由权利和社会机会广泛平等的前提下,对最少受惠者实施偏爱和补偿,借此达到社会最终平等之目的,这正是其结果平等论的立场。

具体来说,罗尔斯的第一原则要求每个人拥有

最广泛的合法权利,这是获得一切平等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第一原则,第二原则会成为社会中占优势地位者的特殊权利。而在第一原则基础上,罗尔斯进一步阐述如何解决在自由合法权利基础上的事实不平等问题。罗尔斯认为,若想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平等,除了以权利平等作为前提和基础,还必须获得机会上的平等,即种族情况、出生情况、所属阶级并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才能”,在相等的机会条件下,杰出者才可以获得更大的物质回报。然而,这期间还有问题,“才能”并非完全是后天努力的结果,天赋才能不平等是客观存在的,因此罗尔斯所提出的差别原则便成为整个理论的核心点,差别原则是对权利平等原则和机会平等原则的重要补充。罗尔斯认为,即使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成为可能,整个社会仍然可能处于一种不平等之中。这种不平等与天赋有关,天赋较优的人将在初次竞争中占据优势,这种优势会随着竞争变得越来越大。这种不平等只能通过不平等的分配解决,那么怎样的不平等分配可以使那些处于劣势者获得平等呢?罗尔斯将其表述为“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罗尔斯指出,应当尽量排除社会历史和自然方面的偶然因素对于人们生活前景的影响。在他看来,由于天赋等偶然因素带来的收益,并不是道德上应得的,天赋应该被看做一种社会共同的资产而非具有较优天赋者的私人资产,因此,在收入分配的时候应当对那些由于出生或天赋等偶然因素而在社会中受到损失的人予以一定补偿。

2. 权利平等论的主要观点

权利平等论主要是针对结果平等论的弊端而提出的。在结果平等论的指导下,西方许多国家实行福利政策。1970年代,西方风行的福利国家政策陷入困境,人们开始对结果平等论进行反思和批判,其中以诺齐克和哈耶克为代表。

诺齐克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对罗尔斯的结果平等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反对罗尔斯的在分配结果中的补偿性再分配,他认为国家的职能不应该包括对于财产再分配的内容,国家只应保护公民的平等权利,任何为了结果平等而进行的再分配,都意味着对个人权利和个人财产的侵犯,正如政府无权在未经个人同意的情况下强迫某人割下自己身上的肉拯救另外一个人一样,政府也无权以累进税的方式强制剥夺一个人的财产来救济其他人。^[3]另外,诺齐克还批评了罗尔斯对平等的论证过程。罗尔斯之所以认为富有者应为穷人买单的原因是因为富有

者在获得财富之时得到了穷人的配合,而诺齐克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诺齐克认为在不违反法律的社会合作中,富人和穷人是在自愿平等的情况下合作的,双方的收益也是对称的,这一切是自由意志的表现,但在再分配中,罗尔斯却偏向于“最少受惠者”而非保持中立。

哈耶克则认为,结果平等或分配平等本身是非正义的。他认为市场机制下个人收入不平等完全合乎自由精神,而结果平等与保护私有财产制度是矛盾的,对收入结果进行人为补偿显然干预了自由的实现。另外,哈耶克认为市场是效率存在的原因,结果平等论使生产效率大打折扣,收入平等会鼓励懒汉而导致生产效率低下。

在批判结果平等论的基础上,权利平等论提出了自己的平等观。他们认为,平等并不是结果平等论者所提倡的经济事物上的平等,而只能是个人在法律面前的同等权利,尤其是在生命、自由和财产等方面免受侵害的权利。

诺齐克强调个人自由权利的首要性,他认为,每个人的个人利益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不能为了社会价值和利益去牺牲个人价值和利益。

哈耶克则认为,我们不可能同时获得经济平等和权利平等,如果二者只能存其一,则只能是法律所保证的权利平等。他指出,如果我们平等地对待天赋不平等的人,结果将导致他们仍处于原来的不平等地位或收入水平,而唯一能使他们获得平等地位或收入水平的方法就是区别地对待他们。由此,他得出结论:法律面前的平等和物质方面的平等是相互冲突的,我们所能实现的非此即彼,并不能同时实现两者。显然,哈耶克认为,法律是“我们能够在不摧毁自由的同时所能确保的唯一一种平等”^[4],人生而平等只能限制在自由权利的范畴内。

总之,权利平等论者心目中的平等,只是法律面前的平等,是人人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平等,是政治权利的人人平等。这种平等承认人们之间天赋能力的差别,从而也承认人们通过自由的努力在社会上所谋求到的有差别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在哈耶克一派看来,这种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它不仅有助于保障人们的自由,而且能促进社会的发展。

3. 对权利平等论的再批判

权利平等论的观点对结果平等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这对于正在陷入高福利泥潭的许多西方国家具有警示意义,但也仍然受到许多理论家的批判,其所存在的问题有:

其一,将权利抽象化。权利平等论者反复强调,自由一权利应当具有无可争辩的优先性,但事实并非如此。在一个权利优先的国家里,自由和权利只对于那些富裕中产、对政治参与有闲情雅致的绅士们有意义,而对于那些经济窘迫的残疾人、流浪汉们,这种权利的优先性则是一种嘲弄。权利的平等应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抽象的权利优先性只存于思想家的脑海里。

其二,将市场的作用绝对化。权利平等的理论基于一种对于自由市场的完全信任,认为自由市场最符合正义,人们在市场中的行为符合自愿平等的交换原则,人们应当对由市场交换行为所引起的盈亏(社会地位的上升或下降、经济收入的增加或减少)完全负责。这一观点有明显缺陷:首先,人们进入市场前的地位并不平等,即市场主体并不平等;其次,交换行为不可能遵循最大理性原则,完全平等的情况只能是偶然,自由市场中的大多数交换并不平等;最后,市场具有盲目性、逐利性、不完全竞争性,不可能是最完美的配置手段。

其三,将权利平等与把握权利能力的平等混淆,偷换了概念。权利平等论认为权利平等是其唯一能够认同的平等,人们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可以保证他们在市场交换中获得平等的交换起点。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即使排除人们先天差异的因素,人们仍然无法获得实际的平等权利。这是因为人们在起点之前的不平等导致其在掌握权利能力方面也存在不平等,即社会弱势群体与社会强势群体对于同一权利充分运用的能力完全不同,所以这种将权利平等与把握权利能力平等相混淆甚至等同起来的做法是荒谬的。

其四,权利平等具有虚假性和欺骗性。基于自由市场的权利平等在某种意义上对于发挥人们的潜能、调动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促进社会快速发展,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这种纯粹形式上的平等是以牺牲事实上的平等为代价的。这种平等仅仅是形式上的平等而非内容上的平等,客观上是对现存的社会不平等的辩护,具有虚假性和欺骗性。现实是,社会精英们打着权利平等的幌子,堂而皇之地对社会底层人群进行无情的剥削和压迫。

三、权利平等论与结果平等论矛盾冲突的原因

权利平等论和结果平等论是西方“平等论”中的主流派别,之所以发生矛盾冲突,有多方面的

原因。

1. 社会现实矛盾变化引起理论冲突

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5]政治哲学思想是人们对政治生活思考的总结和抽象,政治哲学思潮的转向反映了政治生活矛盾的变化。

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麦卡锡掀起的反共浪潮、1960年代的古巴导弹危机及越南战争,使得美国的霸权不断受到挑战,而此时其国内的争取民权运动、黑人抗暴斗争、校园学生运动、大面积的贫困现象加剧,从而使得美国处于一种严峻的政治危机之中,而罗尔斯《正义论》中所探讨的平等自由、公正机会、差别原则等问题,恰以一种理论的方式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建议或希望。但到了1970年代以后,情况出现了新的变化——西方许多国家风行的福利国家政策导致经济出现严重的滞胀,贫困问题重新出现,而且越来越严重。到1990年代中期,美国接受政府救济的贫困人口已占全部人口的10%,英国更达到16%。^[6]这种社会矛盾的变化,使理论界开始对过去各种社会福利政策提出质疑、做出反思,权力平等理论的主张者认为结果平等论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 平等理论的内在矛盾

首先,平等与自由存在矛盾。平等和自由都是人类追求的重要价值取向,但其内部却存在矛盾性。人与人的天赋才能、身高外貌、品德性格、家庭情况并不相同,如果遵循自由是唯一至上的原则,人们按照其自身条件自由发展并进入市场竞争中去,则他们所获得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自然是有差别的。如果基于自由至上的考虑,这种差别是合理正义的,而侵犯这种差别的则是不合理不正义的,通过公共力量进行平等分配则更侵害了自由原则。因此,在现代西方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与平等不仅无法达到统一,而且还是相互冲突的,理论界也由此出现分歧,发展为相互矛盾的两大阵营。

其次,平等与效率存在矛盾。一般认为,平等与效率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和冲突。一般意义上,对于有限资源的竞争是效率产生的前提,收入平等则会滋生懒汉情绪,而降低生产效率,福利国家政策的破产雄辩地说明了结果平等论的政治主张确实存在严重的缺陷。因此权利平等论者认为,平等只应当存在于权利而非分配当中,鼓励个人在同等条件下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更高的物质回报,以此维持社会经济的高效持续发展;该论者也承认这种自由、效率优

先的导向必然会引起社会下层的进一步贫困。结果平等论者认为,平等是人们追求的最重要的价值目标,以效率的名义侵害平等是人性沦落为财富之奴的表现,是唯生产力论的结果,这使得人的尊严和社会公义遭到践踏。对平等与效率的优先性的不同选择,使结果平等论与权利平等论发生理论分歧。

最后,经济平等与政治平等存在矛盾。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人们紧紧地围绕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开展生产劳动。近代以来,资产阶级以自由、民主为名建立起广泛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普通公民成为政治参与的主体。此时,人们基本能够获得形式上的政治权利平等,然而,恰恰相反的是,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由于市场的自由性变得愈来愈大。这种经济平等与政治平等形成一种怪异的张力,既对立又统一。结果平等与权利平等的矛盾实际上就是人们对平等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不同追求所引起的不同政治思想之间的矛盾。

3. 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争论在平等问题领域的延展

在对于自由问题的讨论上,对当代西方影响较深的是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争论。罗尔斯和哈耶克分别是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可以认为他们关于平等的争论也是其关于自由问题的争论在平等问题上的延展。新自由主义强调积极的自由观,认为公共权力应当对个人自由有所作为地进行保障;而新保守主义则认为新自由主义的这种行为不仅没有保障公民自由,反而侵犯了公民最基本的自由权利——自由地选择个人自由的权利。双方对于自由的讨论在平等问题上的分歧则表现为:是否应当使用公共力量对自由形成的分配结果进行再调控。

四、对两种平等理论争论的评价

两种平等理论的争论已持续了半个世纪,各自都有其拥护者,事实上,二者也并非非此即彼、完全对立的关系。其争论对于人类探讨平等问题是有益的。

1. 两种理论的争论是对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

结果平等论与权利平等论之间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现代西方社会在平等问题上所面临的困境。这两种观点都强调了平等的一个方面,并且都对对方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评。

就结果平等论来说,它对社会上的“最少受惠者”表现了特别的关爱,从一个崭新的视角重新对

平等问题进行审视,其理论体系之精致、论证之严密令人叹服。权利平等论针对结果平等论的问题,毫不留情地进行批判,认为权利平等是唯一可以被承认的平等,除此以外一切通过公共力量来构建平等的方式都是对自由的侵犯,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结果平等论的理论缺陷。两种理论相互批判共同推动了现代平等理论研究的发展。

2. 两种理论的争论是对于重大现实问题的探讨

结果平等论是针对西方社会出现的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而提出的,而权利平等论则是在福利国家政策无以为继、经济严重滞胀的时候提出的,两者具有显著的时代使命感和深刻的现实意义。结果平等论的提出有助于改善下层人民生活状况,缓和社会矛盾,为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而权利平等论则是针对结果平等论在政治实践中的失败而提出来的刺激经济增长的理论,某种程度上对于发挥人们的潜能、调动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促进社会快速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3. 两种理论的争论并未解开平等问题的症结

结果平等论和权利平等论分别揭示了平等的两个侧面,即事实平等和形式平等,但他们并没有找到使平等的两个侧面统一起来的现实途径。

事实上,社会存在不平等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严重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生产资料仍然需要通过未必公平的市场竞争掌握在少部分人手中,这种阶级不平等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平等要

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7]因此,真正的平等只有在消灭阶级之后才有可能实现。

同时,真实的平等不仅应当表现在形式上而且应当表现在现实上,不仅应当在法律的领域实行,而且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真实的平等只存在于共产主义社会中,在那里,一切阶级和阶级压迫都消失了,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能真正做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真正做到平等形式与平等内容的统一。因此,平等问题的最终解决只能在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人们思想觉悟的不断提高中逐步实现。

[参 考 文 献]

- [1] [法]伏尔泰. 哲学辞典(下册)[M]. 王燕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44.
- [2] [美]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M]. 何怀宏,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60.
- [3] 姚大志. 自由主义的两个教条——评罗尔斯和诺奇克的两个争论[J]. 哲学研究,1996(9):25.
- [4] [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 自由秩序原理(上)[M]. 邓正来,译. 上海:三联书店,1997:102.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C].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 [6] 李迎生. 西方社会福利问题的四大热点[N]. 学习时报,2003-07-14(5).
-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48.

[文章编号]1009-3729(2013)05-0045-06

论拉美新左翼政权崛起中的美国因素

成晓叶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省行政学院 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 江苏 南京 210013)

[摘要]20世纪末以来拉美地区左翼政权的崛起掀起了一番“粉色浪潮”,这是新千年拉丁美洲政治舞台上的新景象。拉美左翼政权的崛起,美国是其关键影响因素:引入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是拉美左翼政权崛起的经济社会条件;美国推动的拉美民主化进程为拉美新左翼政权提供了制度基础;美国战略视线的转移为拉美左翼政党的崛起提供了政治、外交条件。

[关键词]拉美左翼政权;新自由主义;美国因素

[中图分类号]D73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3.05.008

“左翼”的概念由来已久。“左翼”和“右翼”作为政治术语在1789—179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就被创造出来了,指的是三级会议上的座次安排:那些坐在左边的人基本上是激进革命的,包括支持建立一个共和的世俗政权^[1];而坐在右边的人支持旧政权的传统体制。1815年法国君主立宪复辟后,人们开始正式使用“左翼”这个术语。这个术语后来也被用在一些革命性的运动之中,比如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还有一些诸如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的改革者运动等。左翼这一政治理念范畴涵盖了从中左翼到极左。中左翼概念阐述的是当前主流的政治理念,而极左概念对应的是那些相比之下更加激进的政治立场。中左翼的政党或组织通常包括社会民主党、社会自由党、进步党以及一些民主社会党、绿党(特别是生态社会主义者)。中左翼政党一般主张采取市场资源配置,这种资源配置一般是建立在重要的公共部门和繁荣的私人企业之上的混合经济。极左政治是左翼政治中程度最高的左翼。持极左政治观念的人寻求创造一种完全的或者是程度较高的社会平等且废除各种形式的社会等级制度,他们特别希望结束那种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局面——尤其将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不平等的源头;他们所要建立的社会是一种财富分配完全平等的社

会,在这种社会里人人平等,没有人有特殊的政治权利或者过多的经济财产。^[2]

许多学者认为拉美左翼的政党、运动和左翼领袖都有一个共同的立场:对平等的承诺;倾向于用国家来平衡市场的力量;笃信民众参与的重要性。例如康奈尔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肯尼斯·M·罗伯茨认为,拉美左翼致力于用国家力量或是民众的参与来缓和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并且保护个人和团体,以免受市场不安全因素的影响。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马修·R·克莱瑞将左翼定义为任何历史上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民众社会运动、民粹主义者的社会组织,或其本身将反体系、革命性强和崇尚革新作为目标的政治力量。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麦克斯韦尔·A·卡梅伦认为,拉美左翼的政党、运动以及领导人都寻求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改善拉美不平等的状况,增进社会凝聚力,这种方式有时是自下而上的民众运动,有时是领导人发起的自上而下的政策举措;无论是代表广泛多阶层的联盟还是应对来自特定社会阶级、部门和团体的需求,他们都主张以国家的力量弱化市场的力量;拉美左翼通常以民众参与的方式来推动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转型。虽然一些左翼领袖忽视或并不重视民主,但仍以民众参与来代替两党制,其他拉美左翼

[收稿日期]2013-06-20

[作者简介]成晓叶(1988—),男,江苏省南通市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省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拉美左翼政权、英国政治、民族分离主义。

在现行的宪法和法律体系下仍然坚持民主制,他们都致力于选举民主。^[3]

关于拉美左翼崛起的原因,国内学者大部分观点较为一致,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是拉美左翼崛起的最重要因素,国外学者观点各异。墨西哥前外长豪尔赫·卡斯塔涅达认为,拉美不平等的现实和民主制度的存在是拉美左翼崛起的原因。拉美地区的社会缺陷驱使拉美的选民将选票投给那些能够让他们变得不再贫穷的政党。拉丁美洲在1980年代就已经是一个高度不均衡的地区了,然而民主化的浪潮赶走了军事独裁政权。^{[4](P179)}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从事拉丁美洲研究的库尔特·维兰德教授认为,拉美左翼政党崛起的环境在于新自由主义未能兑现提高人民的生活这一诺言,并且加剧了本身就恶化的就业问题。^[5]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从事拉美政治研究的高级讲师弗朗西斯科·潘尼扎认为,拉美左翼崛起主要有3个原因。第一,民主政治条件下的政治变化情况。1980年代和1990年代,左翼政党的力量在军事独裁以及经济改革失败而失去民众支持的情况下受到削弱。同时,1980年代的左翼政党如玻利维亚的民主人民联盟和秘鲁革新党执政时期的失误使得左翼政党信誉受损。但左翼政党这一时期所产生的危机还不是拉美左翼的政治终点,而民主的连续性有助于拉美左翼重新组织起来,也促进了拉美左翼自身的适应和改革。^{[4](P179)}第二,一定程度上与右翼政党的弥合。毫无疑问,拉美左翼政党的崛起与1998—2002年日益加剧的贫困有关。反对新自由主义似乎是所有拉美中左翼竞选人的论调,但力求成功登上拉美政治图谱的政治目标使得拉美左翼政党的纲领满足范围更广,以此来吸引更多的中间派选民而不是极左或极右的选民。^{[4](P182-184)}第三,拉美左翼能够协调政治与体制之间的关系。虽然拉美的选举现在已经变得公平自由,但政治体制依然十分脆弱和不稳定。腐败以及缺乏透明度和可信度,使国家机构和政党的声誉下降,同时也让那些反对现行制度的候选者从中获利。拉美地区政治的局外者总是得到广泛的支持。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末,阿根廷前总统梅内姆、秘鲁前总统藤森以及巴西前总统卡多佐还未步入拉美政治圈,而近10来年,查韦斯、莫拉莱斯以及科雷亚则以反抗体制的左翼领袖赢得了选举。1990年代初期至21世纪初期反建制的选举人之间意识形态的差异也反映在竞选人所处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当中,1990年代早期的候选人反对政治秩序却无法保证经济的

稳定。而19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的候选人均反抗以新自由主义为特征的政治体制。^{[4](P184-185)}

尽管学界对拉美左翼政权崛起的因素各持己见,大部分论述拉美左翼政权崛起的学术著作几乎异口同声地从不同角度将新自由主义纳入其中。从表面上看,拉美左翼崛起源于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源于拉美左翼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源于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社会不公及就业率低迷等原因,但笔者认为,其本质原因是拉丁美洲“离美国太近、离上帝太远”的地缘政治特点以及美国强大的综合实力使得美国能够轻易地通过新自由主义中的市场开放来获取拉美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当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无法实现当初其给拉美民众许下的诺言时,拉美左翼政权才开始崭露头角。先是1998年查韦斯成功成为拉美的左翼总统;随后,从2002年巴西前总统卢拉的当选以及2006年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尼加拉瓜,2007年阿根廷、危地马拉,2008年萨尔瓦多、巴拉圭左翼政党纷纷成为执政党后,拉丁美洲开始呈现出政治图谱中代表左翼力量的粉红色。拉美与美国的地缘政治关系影响到了拉美左翼政权崛起的各个层面。在社会经济方面,引进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促使拉美左翼政党从选举中脱颖而出;在政治体制方面,美国曾经极力推动的民主化进程为拉美左翼政党走向执政搭起了制度平台;在外交和内政方面,美国对中东、东南亚地区的关注以及对拉美右翼的忽略也成了拉美政坛出现左转的一个因素。自始至终,在拉美左翼政权崛起的过程中,美国因素绝对不能忽视,本文拟从三个层面探析拉美左翼政权崛起中的美国因素。

一、引入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是拉美左翼政权崛起的经济社会条件

新自由主义理论也称保守主义经济思潮,是1930年代后在反凯恩斯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说。19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危机将凯恩斯主义推上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前台并取代古典自由主义。但是19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第二次金融危机“滞涨”之后,凯恩斯主义开始失去市场,新自由主义开始浮出水面。新自由主义在不同的环境下被赋予了不同的定义,在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的具体措施包括:紧缩货币供给、压低工资、抑制通货膨胀、解除政府部门对私人企业的管制、减税刺激投资、削减社会福利和打击工会。而在拉美、亚、非发展中国家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

国家,新自由主义主要推行的是私有化、自由化和非调控化。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领域,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观点是主张解除对国际商品贸易和自由资本流动的限制。^{[6] (P325-326)} 新自由主义在拉美主要以放松管制、自由贸易、私有化为主,以廉价的劳动力为表象,这为一些跨国公司进入拉美以获取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肥沃的土地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在1990—2000年的10年间,跨国超市在拉美的零售份额从10%攀升至60%。拉美地区一时间成为金融投资的热土。随着拉美地区融入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的加深,贸易所占GDP的比重也从1989年的10%上升到1999年的18%。但这看似繁荣景象的背后并非拉美真正的发展,新自由主义同时也给拉美带来了社会不平等、大面积的失业^[7]。芝加哥学派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分支学派对拉美的经济走势有着不小的影响,其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哈伯格以及哈耶克都访问了智利并发表了演讲。美国媒体对芝加哥大学的关注以及哈耶克与弗里德曼在1970年代分别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为芝加哥大学新自由主义学派吸引了诸多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尤其是拉美国家的留学生,阿根廷在1962—1967年一度选送27名学生到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学。同时,美国政府通过援助机构、国际合作局及其后继者国际发展署和福特基金会、富布莱特基金会以及洛克菲德基金会,为新自由主义的传播牵桥搭线,提供资助。^{[6] (P330)} 此外,1980年代早期拉美拖欠美国的巨额债务让拉美在随后的几年中始终处于停滞的状态。针对拉美的发展困境,美国对拉美采取了减免一部分债务以及债务折扣化的“布雷迪计划”,但这种债务的减免只是扣除措施并不是“免费的午餐”,而是要求拉美承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倡导的经济调整计划。该计划要求拉美大幅削减政府开支、设置竞争性汇率、通过减少关税为国内生产者提供补贴、向国外公司开放拉美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虽然促进了全球化的进程——全球范围内国家

监管的放松为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通提供了条件^{[8] (P576)},却给拉美国家带来了不良的后果。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在拉美运行20年的表现。在综合调查拉美19个国家之后,我们可以发现拉美的贫困率和总贫困人口在新自由主义运行后的头10年呈直线上升趋势,1990年代后虽然贫困率偶有下降,但是贫困人口总数却在上升,即使贫困率在1990年代偶有下降但与1980年代刚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拉美相比,其基本比率仍然是增长的。同时相较于新自由主义推行20年中拉美贫困率和贫困人口总数的走势而言,拉美绝对贫困人口总量的走势与拉美贫困人口走势大致相似,不同的是绝对贫困率从1990年代之后看似有所下降,但是与1980年代拉美刚刚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时贫困率只有0.1%的区别,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拉美的新自由主义表面上曾带来一些繁荣,但实质上削弱了国家的主权和经济安全,损害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特别是侵犯了中下阶层的权益,从而导致社会分化、政治混乱等负面结果。对于拉美民众而言,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扩大以及拉美的欠发达,引发了拉美民众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感,而拉美左翼政党异口同声地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牢牢地抓住了拉美选民的心。对于西方的观察家而言,美国以及它的跟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想通过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将新自由主义强加给拉美国家。一些洞察力更深的观察家从历史的深度来解读这些现象,他们中的一些人联想到了殖民时期,另一些人则联想到了19世纪的巴林危机。但无论经济改革的理由是什么,拉美地区的观察家们都会对经济改革的根源产生不同程度的怀疑情绪;另一些观察家甚至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于共产主义欧洲幽灵的话转述为一个幽灵,一个自由主义、自由市场以及自由竞争的幽灵在拉丁美洲徘徊^[9]。随着拉美民众对新自由主义的持续反抗,巴西劳工党领导人卢拉2002年在女

表1 1980—1999年拉丁美洲贫困人口和绝对贫困人口变化情况

年份	贫困人口						绝对贫困人口					
	总数		城市		乡村		总数		城市		乡村	
	数量/百万	占比/%	数量/百万	占比/%	数量/百万	占比/%	数量/百万	占比/%	数量/百万	占比/%	数量/百万	占比/%
1980	135.9	40.5	62.9	29.8	73.0	59.9	62.4	18.6	22.5	10.6	39.9	32.7
1990	200.2	48.3	121.7	41.4	78.5	65.4	93.4	22.5	45.0	15.3	48.4	40.4
1994	201.5	45.7	125.9	38.7	75.6	65.1	91.6	20.8	44.3	13.6	47.4	40.8
1997	203.8	43.5	125.7	36.5	78.2	63.0	88.8	19.0	42.2	12.3	46.6	37.6
1999	211.4	43.8	134.2	27.1	77.2	68.3	89.4	18.5	43.0	11.5	46.4	38.3

性群体、黑人以及巴西无地农民运动的支持下成功当选总统。在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原住民和工会联盟、妇女组织和学生群体一同组织起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财政紧缩计划,同时将选票投给了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和厄瓜多尔的科雷亚。在委内瑞拉,环保人士、原住民和工会也同样组织起了反对新自由主义、支持查韦斯的选举活动。查韦斯所推行的一系列新政中包括加强对委内瑞拉石油资源的国有控制,为国内外反贫困计划筹集资金的项目。在阿根廷,新自由主义导致的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也引起了民众要求关闭银行以及对国外债务进行拖欠为主题的大型街头示威游行。阿根廷贫困的蔓延和政治抗议频繁以及粮食暴动很快将支持新自由主义的总统赶下台而选举了民众主义者基什内尔,基什内尔与许多阿根廷人一样,都愤怒地抨击富裕的银行家以及资本家过时的新自由主义的所谓社会正义学说。^[10]

二、美国推动的拉美民主化进程为拉美新左翼政权提供了制度基础

美国长期对拉美进行干涉,这种干涉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外交领域,也反映在内部政治制度方面。张凡在《当代拉丁美洲政治研究》一书中将拉美民主化进程的原因归结为四个方面:历史遗产、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国际因素。其中国际因素在推动拉美国国家民主化转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很多情况下,外部势力甚至直接干预一些国家内部的民主化进程。在拉美国家的民主过渡中,国际组织和一些国家间接或直接地施加了各种影响,如联合国附属机构、欧洲联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11] 马丁·尼尔森也认为,拉丁美洲国家民主化转型之内部条件是要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与民主化结合在一起,外部因素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美国也都希望将两者结合起来。而上述内部和外部因素都要求将自由公正的选举同结构性经济改革相结合。美国则通过对国际机构的多边或双边影响促使这些国家创建并发展起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虽然美国有时又是摧毁拉美民主的罪魁祸首,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对民主的推崇在拉丁美洲第三次民主浪潮的进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2] 而拉美方面也不得不接受美国推行的民主秩序。二战以后,拉

美政府为了保持进口替代工业化项目来自美国的贷款和投资,急于向美国展示自己的民主凭据。^{[8](P352)} 此外,美国也从经济上扶持拉美的民主,除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支持拉美的民主以外,美国于1983年创立了全国民主基金会(NED)及其附属机构全国民主研究所、国际共和研究所,意欲通过这些机构来推动民主机构的成立、促进民主价值观的推广,而这些机构最先开始在中美洲运行。^[13] 1974年,美国决定实行并在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扩张之后,就开始放弃支持独裁政权的政策转向促进其他国家的人权和民主化。^[14] 正如当代美国保守派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所说:“里根和布什执政期间,美国政府采纳的是一条民主版本的勃列日涅夫主义(Brezhnev doctrine):在其势力范围之内不允许民主政府被推翻。”^[15]

自查韦斯1998年通过竞选成为委内瑞拉总统以来,其余拉美左翼政党全部通过民主选举方式上台执政。而拉美民主体制的延续与美国以及美国所控制的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不无关系,美国所极力推动的拉美民主化进程又间接地为拉美左翼政党通过民主选举方式执政提供了内部政治体制条件。虽然拉美民主化成因复杂,但从国内学者和国外学者的论述中我们都能看到美国因素,美国对拉美民主化进程的推动无形中为拉美左翼政党通过选举上台执政提供了制度条件,因此在拉美左翼政权的崛起中美国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

三、美国战略视线的转移为拉美左翼政党的崛起提供了政治、外交条件

拉美作为美国的“后院”,在21世纪之前几乎都以美国的“马首是瞻”,拉美虽然对美国时有反抗但由于实力差距悬殊仍难以与美国抗衡。二战以后为了抵御苏联对拉美的影响,美国极力扶持拉美右翼独裁政权以此打压支持苏联而又反对美国的拉美左翼力量。1948年,美国与20多个拉美国家在第九次美洲国家会议上改组了泛美同盟,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所谓的来自西半球以外的“共产主义威胁”问题,最终通过了反共决议。美国为了加强对拉美的控制,对拉美许多国家,尤其是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政权,一直不遗余力地企图推翻,即使这些政权是通过民主合法的方式获得的,如危地马拉的前总统阿本斯以及智利前总统

阿连德等被美国推翻的领导人都是经过合法选举上台的。据不完全统计,1948—1958年间,美国在拉美策划的政变和颠覆活动达16次之多,其中比较重大的有秘鲁、委内瑞拉、古巴、巴西等国的政变或政变阴谋。^{[16](P137)}截至1999年,右翼政权在拉美的前景还显得十分乐观,因为自1990年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在竞选中失利后,西半球只剩下了古巴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时,美国著名学者福山抛出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社会将会进入以民主和市场为主导的政治经济形式。^{[17](P11)}然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得到验证,相反的情况却发生在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9·11”事件的突然爆发对美国而言是一场灾难,而对于拉美左翼政党而言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美国所支持的拉美右翼政权被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恶果折磨得苦不堪言,加之“9·11”事件后美国开始将视线转向中东地区,将中东恐怖分子视为头号敌人,放松了对拉美右翼的支持,此时拉美的左翼政党领袖查韦斯、科雷亚、卢拉等,通过反对新自由主义、控制贫困以及将大企业国有化的竞选口号纷纷赢得选举,走上拉美的主流政治舞台。美国深陷中东反恐战争泥潭,继续对中东地区投入大量的精力、财力,而在无意中忽视了拉美左翼的崛起,拱手将拉美这块“后院”的控制权让给了拉美左翼势力。

2001年12月,阿根廷发生经济危机后,美国对阿根廷袖手旁观、无动于衷的态度,遭到拉美舆论界的一致批评。^{[16](P263)}这进一步加快了拉美左翼政党的崛起。从时间顺序来看,2005年乌拉圭的巴斯克斯,2006年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厄瓜多尔的科雷亚、尼加拉瓜的奥尔特加,2007年阿根廷的基什内尔,2008年危地马拉的科洛姆、萨尔瓦多的卡塔赫纳以及巴拉圭的卢戈的,便是拉美左翼崛起的连续性标志。

拉美左翼政党上台执政以后,在国际关系方面倾向于多边合作,处于发展阶段的拉美亟需外部的帮助。以委内瑞拉为例,援助拉美原本是美国的事务,但由于美国专注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而无力经营拉美,委内瑞拉希望从多边关系中寻求帮助,便加强同俄罗斯的关系、强化与中国的关系、保持同欧盟之间的关系等。许多拉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国际关系中被美国外交政策所边缘化和排斥的国家,将中国的崛起视为一种机遇。^[18]与此同时,在拉

美左翼政党执政之后也加强了相互之间的一体化进程,政治上有社会党国际,经济上有南方共同体市场、玻利瓦尔替代联盟、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一体化和发展部长级会议、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南美国家联盟。这些组织和共同体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便是以更独立的方式或是通过减少与美国合作亦或是采取以分化和外部施压的方式来强化离开美国控制之后的自主权。其中,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被媒体称为“没有华盛顿的美洲国家组织”,以此凸显其排美的态度。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必将取代影响力日趋式微的美洲国家组织。”^[19]查韦斯的表态得到一些国家的支持。厄瓜多尔外长帕蒂诺说:“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成立的最终目的,就是取代美洲国家组织。”^[20]此外,在防务方面,由巴西和委内瑞拉牵头正试图建立一个将美国和加拿大排除在外的南美防务委员会,南美地区同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经济政治联系也越来越紧密,这些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17](P48)}

四、结语

相较于1990年代的拉丁美洲,21世纪的拉丁美洲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一是古巴不再是拉美唯一由左翼执政的国家,更多的拉美左翼政党开始成为执政党,拉丁美洲的政治图谱上也呈现出鲜艳夺目的粉色。二是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也使得拉美左翼之间形成了良好的经济、防务方面的一体化组织。

毋庸置疑,拉美左翼政党的崛起与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破产是密不可分的,美国战略视线的转移为拉美左翼政府开展多边合作关系以及一体化趋势的加强提供了空间,同时美国对拉美民主化进程的推动也间接地为拉美左翼政权提供了政治体制基础。总而言之,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政治维度抑或是外交层面来剖析拉美左翼政党的崛起,都不能离开美国这一关键的影响因素。

[参 考 文 献]

- [1] Andrew Knapp, Vincent Wright.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France* [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2.
- [2] Oliver H Woshinsky. *Explaining Politics: Culture, Institu-*

- tions, and Political Behavior [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145 - 149.
- [3] Maxwell A Cameron. Latin America's left turns: beyond good and bad [J].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09, 30 (2): 331.
- [4] Francisco Panizza. Contemporary Latin America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Beyond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M]. London: Zed Books Ltd, 2009.
- [5] Kurt Weyland, Raúl L Madrid, Wendy Hunter. Leftist Governments in Latin America Successes and Shortcoming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
- [6] 徐世澄. 拉丁美洲现代思潮 [M].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0.
- [7] William I Robinson. Latin America in the New Global Capitalism [R]. SUMMER 2012 NACLA Report on the Americas, 2012(45): 2.
- [8] Edwin Williamson. The Penguin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Part Four Towards A New Era [M]. New York: Penguin Group, 2009.
- [9] Sebastian Edwards. Left Behind Latin America and The False Promise of Populism [M]. Chicago,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71.
- [10] Benjamin Keen, Keith Haynes. A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EIGHTH EDITION) Independence to the Present [M]. Asia: Cengage Learning, 2008: 288 - 289.
- [11] 张凡. 当代拉丁美洲政治研究 [M].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9: 59.
- [12] Manuela Nilsson, Jan Gustafsson. Latin American Responses to Globaliz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80.
- [13] Richard L Millett, Jennifer S Holmes, Orlando J Pérez. Latin American Democracy Emerging Reality or Endangered Species? [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338.
- [14] 苏振兴. 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395.
- [15] [美] 亨廷顿. 第三波——20世纪民主化浪潮 [M]. 刘军宁, 译. 上海: 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8: 48.
- [16] 徐世澄. 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 [17] Francisco Dominguez. Geraldine Lievesley and Steve Ludlam Right-Wing Politics in the New Latin America: Reaction and Revolt [M]. London: Zed Books Ltd, 2011.
- [18] Shen Ding. To build a "Harmonious World": China's soft power wielding in the global south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J]. Research Gate, 2008, 13(2): 193.
- [19] 网易财经. 查韦斯欲组建拉美“三驾马车” [EB/OL]. (2011 - 12 - 05) [2013 - 06 - 15]. http://money.163.com/11/1205/08/7KG8LN600253B0H_2.html.
- [20] 新华网. 拉美诞生新共同体“抱团”发展 [EB/OL]. (2011 - 12 - 05) [2013 - 06 - 15].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12/05/c_122378741.htm.